

# 凤凰于飞：

---

## 家族文书与畲族历史研究

---

A Journey of Phoenix:  
The History of She People in South China

---

刘婷玉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本书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课题编号20720161059

# 凤凰于飞：

## 家族文书与畲族历史研究

A Journey of Phoenix:  
The History of She People in South China

刘婷玉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凰于飞：家族文书与畲族历史研究/刘婷玉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615-7055-5

I. ①凤… II. ①刘… III. ①畲族—文书—研究—中国 ②畲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K28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8569 号

---

出版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冀 钦

封面设计 夏 林

技术编辑 朱 楷

---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 销 中 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

开本 889 mm×1 194 mm 1/32

印张 12.5

字数 286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8.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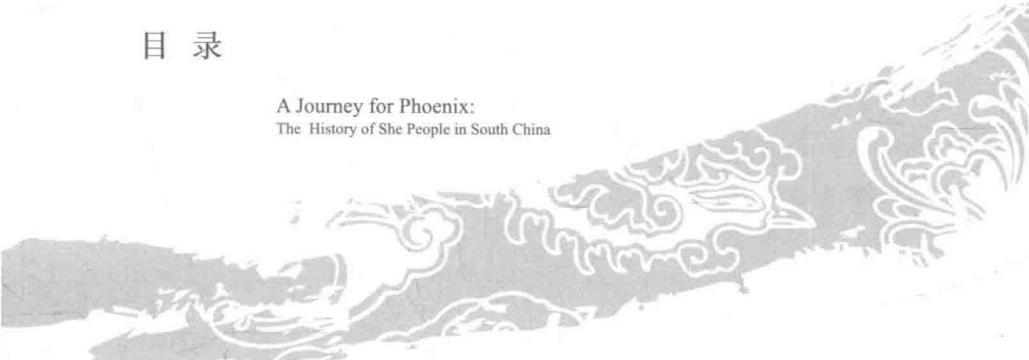
本书是一部历史研究学术著作，

书中任何词句不包含作者和出版社对当代民族宗教相关问题的意见，

特此声明。

# 目 录

A Journey for Phoenix:  
The History of She People in South China



绪 论 .....	1
一、问题之提出：“畲”的主体性失语	1
二、研究史回顾	7
三、史料与基本构架	27
 /第一章 /	
作为族名的“畲”的历史渊源 .....	35
第一节 释“畲”	37
一、作为现代民族意义上的“畲族”	38
二、历史情境中的“畲”、“𪨶”	39
第二节 由家族文书看“畲”与“瑶”的渊源	43
一、畲民家族文本的分类与结构	43
二、畲民祖图的内容与结构	47
三、畲民家族文书与瑶人文书	50
三、畲民的民族时间和家族时间	56
第三节 南岭民族走廊视域下的“畲”	67
 /第二章 /	
狄青何不附梁公？——由族谱资料看明清畲民的家族建构 .....	73
第一节 以往研究中对畲族谱牒资料的运用	75
第二节 畲族族谱的修纂与家族建构	80

一、雷信国、陈雪观与《惠安丰山雷氏族谱》	82
二、钟鸣云与《福鼎丹桥颍川郡钟氏宗谱》	87
三、雷云与《冯翊郡雷氏族谱》	99
四、王聘三、王作梅父子与福鼎《汝南蓝氏宗谱》	107
五、异议者——钟大焜的《钟氏连环谱》	115
<b>第三节 汉化、儒化与齐民化</b>	<b>129</b>
一、有关“汉化”的学界论争	130
二、畲民家族的“齐民化”	135
<b>/ 第三章 /</b>	
<b>由族谱看明清畲民迁徙源流</b>	<b>.....139</b>
第一节 畲民迁徙源流的研究回顾	141
第二节 族谱中所提供的迁徙线索	147
一、明以前来到闽东浙南说	147
二、畲民来到闽东的最早记录	161
第三节 元末明初的闽东社会与畲民入迁	170
一、元末的闽东大乱与人口流失	170
二、明初闽东的卫所屯田与畲民入迁	177
第四节 明中后期畲民的持续迁徙	195
一、畲民《行程志》提供的迁徙线索与畲族的多元化来源	195
二、明中期的历史变迁与畲民在闽浙地区的频繁迁徙	206

/第四章/	
畲军、畲寇与宋元的“畲”	211
第一节 宋元战争中的“畲军”、“畲寇”	213
一、陈吊眼、许夫人的“畲军”	216
二、黄华“畲军”	224
三、陈懿兄弟“畲军”、梁国杰之“畲军”	229
四、“畲寇”钟明亮	232
五、“畲寇”李志甫	238
第二节 元人视野中的“畲”	241
一、作为生产、生活方式的“畲”	241
二、作为叛乱之人、地	244
第三节 元代及之后的“畲军”去向	246
一、陈吊眼之畲军	247
二、其他畲军去向	253
/第五章/	
婚姻圈与“畲”之边界确定	257
第一节 明清方志文集中与“畲”有关的姓氏内婚群体	259
一、广东地区的畲民姓氏内婚群体	262
二、福建、浙江地区的畲民内婚群体	270
三、江西的畲民内婚群体	276

第二节 畲民族谱世系的婚姻圈例证	277
一、闽东畲村的婚姻圈	277
二、闽南官畲村的婚姻圈	280
第三节 “畲军”（寇）姓氏与内婚制畲民家族的比较	287
/第六章/	
“行第”名、道教科仪与畲、客郎名	291
第一节 唐宋时期行第名的使用	296
一、唐代的行第名	296
二、宋代的行第名（数字郎名）	298
第二节 数字郎名的区域传统	312
一、“念”、“郎”与区域口语传统	312
二、郎名与瑶族命名仪式的关系	317
第三节 郎名、法名与道教仪式传统	318
结语：谁人为畲	329
一、“畲”为土著——一个中原中心的视角	331
二、宋元之“畲”与明清之“畲”	337
三、“族群性”与“国民性”之争：对“民族”概念的反思	348
参考文献	365
附录	381

## 绪 论

### 一、问题之提出：“畲”的主体性失语

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显然是 20 世纪至今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受人瞩目的问题之一。历史学也不能自外于此，有关汉民族的形成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少数民族问题，被视作 20 世纪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sup>1</sup> 正如杜赞奇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无可争辩地为民族国家所支配。然而，尽管历史总是属于某个民族，民族本身却是颇有争议的现象”。<sup>2</sup> 所以在确定以“畲族”作为一个历史学

1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是指：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参见肖黎，《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页 1。

的考察主题的时候，仅仅在对研究主体进行界定的第一步就遇到了问题：被称为“畲”的这个群体到底该如何进行界定呢？

按照最新一版的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2008年修订出版的《畲族简史》的介绍：

“畲”字被用作民族的族称，始于南宋末年……元代以来，“畲民”逐渐被作为畲族的专有名称，普遍出现在汉文史籍上。……“畲”字作为民族名称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当时畲族到处开荒，使用刀耕火种的方法，是以这一民族经济生活的特点而命名的。……以“畲”字作为民族名称，虽然不是本民族自称，而是他称，但这个称呼无论其来源或含意都体现了畲族人民勤劳勇敢的劳动本色。<sup>1</sup>

“畲”字作为族称，不是自称而是他称，这意味着“畲族”在当代的中国社会中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出现的。将“他称”作为一个民族的族称先于其自我认同，这个政治概念的界定并不仅仅出现在畲族，也同样出现于其他的少数民族，和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

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工作者是如何进行畲族的民族识别的，这里以1955年的广东畲民识别调查作为例子。在“对于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单位的看法”一节中，民族工作者记录了三个不同地区的后来被识别为“畲族”的少数民族群众的意见：

凤凰山区：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族，虽然过去被汉人骂

<sup>1</sup> 《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畲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页10—11。

为畲客，但自己并不明确自己是畲人，只觉得讲话、舂米、祖公与别人不同，不知道自己是否是畲，对称为畲，没有什么意见；

莲花山区：海丰县、惠阳县的畲民自称“贺爹”，解放前他们就明确意识到自己是“畲人”，区别于“平地人”……汉人称他们为“畲哥”……惠阳县“畲人”族谱上虽载有“瑶人”的名，但群众只知道自己是“畲”，不知道“瑶人”的名称。

罗浮山区：增城、博罗两县自称“贺爹”，具有盘瓠祖先传说和姓盘、蓝、雷、来的人却自认为是“瑶”，他们从未听老辈说过自己是“畲”。……他们很坚决的要称为“瑶”。<sup>1</sup>

不难看出，这些后来的“畲族”在民族识别之时并没有统一的对于“畲”的族群自我认知，即使认为自己是“畲”，也是因为被周围的汉人称为“畲”的原因。“畲族”作为一个被“识别”的民族，其民族的属性是由识别者确定的，即使其族群内部认同都难以统一。而且如果细读当时的民族调查报告，就会发现这个被识别的族群更多地是以“被压迫阶级”和“革命者”的形象被塑造，其文化方面的种种差异性反而是可以相互妥协的。

那么可以说“畲”作为一个族群概念是经过 20 世纪 50 年代以政治手段进行民族识别而确立下来的吗？又不全然如此。在宋到明清乃至近代的历史文献中，的确可以发现有一支在闽、粤、赣地区被认为

<sup>1</sup>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辑组编，《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 49。

有特殊文化特征的族群被称为“畲”。明清的闽、粤、赣方志中，关于“畲”的记载并不少见，以清代道光十二年的《建阳县志》为例，其中就专辟一章“余民风俗”来描述当地的这一族群，认为他们是古代福建土著的后裔：

汉武帝时，迁闽越民，虚其地，有匿于深山而迁之未尽者，曰余（畲）民。徭……嘉庆间，有出应童子试者，畏葸特甚，惧为汉人所攻，遽冒何姓，不知彼固闽中旧土著也。<sup>1</sup>

若再将历史的眼光拉长，现在有文献记载中最早将这一群体称为“畲”的南宋年间，是时任漳州知州的刘克庄：

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徭<sup>2</sup>，曰黎，曰蠶，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畲长，拔止于机毒矣。汀赣贼入畲者，教以短兵接战，故南畲之祸尤烈。二畲皆刀耕火耘，厓栖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畲田不税，其来久矣。<sup>3</sup>

刘克庄作为记录者的角色，很明显是从“有国者”的角度出发。在漳州被称作“畲”的这个群体，在他看来是和蛮、徭、黎、蠶同质的“溪洞种类”，但其划分的标准其实更多的在于“畲田不税”。所

1 赵模编撰，《民国》《建阳县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载道光十二年县志“余民风俗”，卷8，页39。

2 此处原文“徭”为古代文献中对少数民族的蔑称，为尊重少数民族感情，本书中出现的“徭”均替换为“徭”。

3 （宋）刘克庄，《漳州谕畲》，《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2401。

以在王朝统治者的眼中，是否是缴纳赋税的“编户齐民”，才是划分“畲”与“省民”的根本差别，所以在漳州的畲民被籍户口为“版籍民”后，“畲民即吾民也”。

但即使以是否纳入编户齐民的系统来划分“省民”与“畲”，也并不代表二者之间的族群界限是清晰的，实际上在大部分的情境下，王朝的记录者们无法在实际中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记录。宋末将乐人吴林清的命运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刘克庄记录了漳州地区的“畲”仅仅三十多年后，南宋朝廷已经无法避免为元军覆灭的命运。这时，福建北面的将乐县守卫吴林清对时事做出自己的判断，整合了本县的“诸团义兵”，投降了元军。他在之后参与了元军平定福建地区的各场战役，尤其是其中被称为“畲寇”叛乱的陈吊眼、高日新、黄华的战斗。但就在最后一次平定大规模的号为“畲寇”钟明亮的叛乱后，吴林清自己也在上报的奏疏中被称为“畲军头目”<sup>1</sup>，虽然最后得到了平反，但仍然不难由此看出，当时作为当朝者的元朝廷并没有对“畲”有着清晰的族群差别上的界定。对于统治者、征服者来说，这时的“畲”与“非畲”的界限，更多的在于是归顺之“民”还是反叛之“寇”。

从宋元时期作为“叛乱者”“化外之民”的“畲”，到明清时期在福建地区因为特别的风俗而承载了“闽中旧土著”联想的“畲”，直到在民族识别中的“革命者”“被压迫的阶级”，很难在这些历史资料中找到一个稳定的“畲”族。如同杜赞奇在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进行研究时所指出的，尽管在近现代民族主义的语境下宣称民族具有一种统一的身份认同，但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先于社会和文化表述的原

1 （明）李敏编，《弘治》《将乐县志》（明弘治刻本），卷12，页38—42。

收录（元）黄文仲（候官县尹），《武略将军广德路同知吴公墓表铭》。

始的民族的“自我”<sup>1</sup>。从这个具有人类学色彩的分析的角度，也可以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先验的“畲族”，而是在不同时空中，不同的权力语言的影响下，在许多变化的表述网络中形成“畲”的建构。

诚然，在每一个层次的表述网络中，权力的语言总是占有优势地位，所以在史料中可以看到的，是宋元统治者的“畲寇”，是明清士大夫眼中的“闽中旧土著”，也是民族工作者所识别的“被压迫的阶级”。这些身份并不具有时空上的连贯性，但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畲”本身的主体性失语，“畲”作为一个被建构的对象，很难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许对于一个受到人类学、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员来说，解构这许多层的“文化表述”已经足够。但对于一个历史学的研究者来说，尽可能地发掘史料以还原这个被“表述”的历史主体，才是最终的使命。这是我选择以畲族自己书写的历史文本（族谱、祖图以及宗教科仪书）来进行研究的出发点，即使以此来重构这个东南少数民族族群历史的工作未必能够完满，但至少从“畲”的角度来追溯“谁人为畲”这个问题，总是可以部分地使“畲”这个“被表述”者打破主体性失语的局面。这个想法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近几年来学界对于中国历史的“中原中心观”的反思<sup>2</sup>。

1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页5。

2 鲁西奇，《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1—6。陈支平，《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的逆向思考》，《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4期。

## 二、研究史回顾

### 1. 清末民国的民俗学发展与畲族研究之滥觞

对于身处王朝中心的传统史学家来说，“闽”地自古即为蛮荒之地。所以对于福建地区生活人群的特异风俗的描述代不乏人。但真正意义上的对“畲族”的学术研究，应当说开始于清末民初时期。

清末民初的研究者对于边疆史地以及少数民族的强烈兴趣，和这一时期风云激荡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在外敌入侵的新闻不断刺激着知识分子的神经时，大量的研究者带着饱满的民族主义情绪投入了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sup>1</sup> 畲族的研究也正是开始于这样的历史情境中。

西方人类学对于族群的划分方式<sup>2</sup>剧烈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其中有思想开明者，试图通过西方民族学的方法来重新划分新的世界视野下的人类族群，并在其中寻找自己族群的定位。浙江云和的魏兰<sup>3</sup>编写的《畲客风俗》一书是现在可以看到的较早有关畲族的近代学术研究。从魏兰对于畲客的描述来看，他更多地受到了书中所附录的中国古典文献和明清方志的影响，其对畲民的评价带有偏见

1 边疆学研究的兴起参见娄贵品，《“西南研究”与中国边疆学构筑》，《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

娄贵品，《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学术探索》，2012年8月。

2 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19—24。张子辉，《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未刊稿，2005年，页3—7。

3 魏兰（1866—1928），字石生，（浙江云和）县城中街铺人。著有《再生宝吟草》《浮云集》《畲客风俗》《陶焕卿先生行述》《泣告全国同胞书》等20余卷文献。参见方金雨主编，《云和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593—594。

和歧视色彩。

在魏兰此书发行日本之后，日本学者因此对浙江的畲客产生了兴趣，陆续有山崎直部和西丰省三在日本的《人类学杂志》上发表有关处州“畲客”的介绍文章<sup>1</sup>，但其中多为转录见闻，研究成分很少。中国的期刊杂志上也陆续出现对“畲客”的介绍，但也多集中在浙江地区，并且以见闻记录为主。<sup>2</sup>真正对畲民进行有民族学背景的调查研究的，还要算沈作乾<sup>3</sup>于1925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畲民调查记》<sup>4</sup>。沈作乾本身生长在括苍，幼时曾有畲妇为乳母，与畲民关系相当密切，因此其调查较之魏兰更为细致真切。他从畲民的居住区域、生活情况、风俗、思想、性情、畲汉关系、畲民由来各方面详细讲述自己的调查所得，不少内容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相当的民族学价值。且沈氏行文饱含理解之同情，在对畲民普遍歧视的环境中可谓相当难得，他在文首强调畲民“总是我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在中华民族的组织史上应有相当的地位”，可见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认知已较魏兰前进了一大步。

更值得一提的是，沈作乾的畲民调查及研究也同时发表于1925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的研究成果，可以看作是1918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北大歌谣征集和风俗调

1 （日）山崎直部，《有关畲族》，《人类学杂志》，1911年1月。

（日）西丰省三，《清代浙江省处州府的畲客》，《人类学杂志》，1911年5月。陈裕菁译中文稿刊发于《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八号。

2 冯巽之，《畲民暨民九姓渔户考》，《地学杂志》，1914年5月。

胡先骕，《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畲客述略》，《科学》，1923年7月。

3 沈作乾，（1901—1951），字连三，碧湖镇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曾任驻芝加哥总领事馆领事等。

4 沈作乾，《畲民调查记》，《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7号。

查活动的重要组成。北大的歌谣征集活动和风俗调查会在全国范围内都掀起了巨大回响，也影响了顾颉刚等一众民俗、历史学家，包括民国时期重要学派“古史辨”学派的历史走向，因此被视作是中国近代民俗学的开端。<sup>1</sup>

由于北方形势的紧张，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教授纷纷南下，参与到厦门大学国学院的筹办中<sup>2</sup>，文化精英的南移，使得这一时期的福建文化和民族研究被推向高潮。在厦大国学院兴建之前，曾经参与过北大风俗学会的陈锡襄和董作宾就先后于1924和1925年南下来到福建协和大学任教，促成了“闽学会”的成立<sup>3</sup>。按照陈锡襄的想法，他想要“把北大的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考古学会的计划熔而为一，组个大规模的‘闽学会’”<sup>4</sup>。可见“闽学会”之建立雏形，基本是脱胎于北大国学门的风俗调查会的，应被视作当时全国性的歌谣收集和民俗调查运动的一部分。

在福建协和大学“闽学会”的推动下，这一时期也是畲族研究的高产时期，如后来成为甲骨文研究大师的董作宾这段时间就一连发表了三篇有关福建畲民的文章，具体有《说畲》<sup>5</sup>、《福建畲民考略》<sup>6</sup>和《畲

1 王存奎，《北京大学与中国民俗学的建立》，《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7期。

2 桑兵，《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

3 参见汪毅夫，《福建协和大学与福建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4期。

4 陈锡襄，《闽学会的经过》，《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卷第7号，1927年12月13日。

5 董作宾，《说畲》，《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第2卷。

6 董作宾，《福建畲民考略》，《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1927年第1卷，第2期。